

回忆萧友梅先生

廖辅叔

辛亥革命以来，象萧友梅先生那样把音乐教育当作安身立命的事业，而且始终如一，到死方休的，算起来人数并不多。同他一辈的人物，如李叔同，曾经是创作新歌曲的开山，到了五四运动前一年，就已经在杭州虎跑寺做了和尚；王光祈，新文化运动以后研究中国律学和音乐史的专家，到了抗日战争前一年，就已经客死德国波恩。他们活动的时间都不及萧先生那么长，社会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盖棺论定，萧先生可真够得上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当然，由于中国社会飞速的发展，到了后期他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是饮水思源，萧友梅还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中华民国史》将要为他立传，这篇回忆性质的小文章就算是萧传的参考资料吧。

香山萧家先前该是一个大族，我看过先生老家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座楼房，里面可以住上不少人。但是后来似乎中落了，所以萧先生留学日本的那段时期，在他考到留学生官费之前，要靠翻译来挣点生活费。那是这样的一种翻译：日本教师在那里讲课，他站在旁边跟着翻译。因为当时“大清帝国”的许多留学生，根本听不懂日本教师的话，必须花钱请一个翻译来传话。民国初年，他去德国留学，一开头就是官费生，生活应该富裕一些了。但是他的家庭不同意他出国，因

为他有维持家庭生活的责任。解决的办法是他留学之后，要把官费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寄回中国去补贴家用。因此他在德国留学时期生活总比一般留学生俭朴。听我的哥哥说，他当时是在修道院里面租用一个房间，房租比城市住房便宜，又可以安心读书。中国从前的读书人为了安心读书，常常是寄寓在庙宇里面的。想不到萧先生出洋留学，依然继承了这个传统。

一九〇六年萧先生加入同盟会。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已经受到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的注意，随时有被追捕的危险，萧先生的住处因此成为同盟会的联络点。萧友梅是学音乐的，与政治可以说没有什么瓜葛，可以避开暗探的狗鼻子。据说孙中山先生与廖仲愷先生一班人开会的时候，萧先生实际上不可能像其他革命家那样指天划地，审时度势，于是萧先生就站开一边，抱弄廖先生的孩子，以便他们专心筹划革命大计。经过实践的考验，孙中山先生很欣赏萧先生的为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即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他的书房里一直摆着一张孙中山亲笔题着“友梅先生惠存”的照片。

德国大学生有一种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习气，通称为“学院一刻钟”，意思是迟到一刻钟进入课堂不算迟到。我们的萧先生却利用这一时刻钟让教师当面修改他的作业。他那种爱惜时间的习惯是处处表现出来的。一九一

六年他考取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打得难解难分，海陆交通都陷于断绝状态，他不能立即返回，于是又转到柏林大学听课，并在歌咏学社(Singakademie)研究合唱艺术。他真的是把别人上跳舞厅、咖啡馆的时间都用到研究工作上面去了。

要在旧中国推广音乐教育，萧先生具有善良的愿望，至于促使他的善良愿望得以实现的，则是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先生。早在一九一六年蔡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就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但是真正谈得上发生相当社会影响，却是由于萧先生提议将音乐研究会改为音乐传习所之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这个管弦乐队，说寒碜是够寒碜的，全体成员只有十七人，其中有些人还是从前海关总税务司遗留下来的，但总算是我国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而且向群众介绍了西洋的器乐曲，甚至于交响乐。有一次徐志摩给学生讲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认为学生“没有听过夜莺就是一个困难”，为了让学生得到一点对夜莺的实感，他建议大家去听萧友梅先生指挥的贝多芬的第六“沁芳南”（交响曲）。这在当时真可以算得是空谷足音呢。关于萧先生的作品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一九二一年中国留法学生因反对中法反动派互相勾结，出卖中国国家利益，被法国反动军警逮捕的时候，陈毅同志在狱中高唱《卿云歌》，借以表示中国人独立不屈的气概。这首《卿云歌》的作者正是萧友梅。虽然这首歌被北洋政府选定为“国歌”以及其后出现的一些情况，使得对于这首歌的客观效果的评价成为一个较复杂的问题。但陈毅同志当时高唱这首歌曲是用作战斗的武器的，这说明这首作品有其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一面。

萧先生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主要是在教

育方面，创作仅居次要的地位。他创作的旺盛时期是在一九二〇年初到北京到他同时兼任北京几个大学的音乐系主任那几个年头。当时国内创作的新歌是很少的，为了教学需要，他往往是随写随教。一九二二年他的《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先后出版，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新耳目的盛事。虽然这些歌曲，特别由于那陈旧以至俗滥的歌词，加以在作曲技术上也不无可议之处，今天大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一看，这是将近九十年前编印成册的新歌，而且想一想新文学运动初期，胡适的《尝试集》也曾经算是呱呱叫的新诗，两相比较，似乎也不必求全责备了吧。至于他在教育方面最快意的一件事则是他经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音乐院。过去他虽然身兼数职，总不免是寄人篱下，甚至于引起别人的讨厌。实际上音乐这一门在当时的高等学校里面不过是附庸的附庸，有的称为图音系，有的称为音体系，有的还称为图工操唱。经过他的努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体科终于两科分立，然而究竟还不能说是理想的专业教育机关。只有开办了独立的音乐院，才可以放手去干。但是说起来可怜，堂堂音乐院一个月经费只有三千元，一年之后，几经交涉，才增加到五千元，因此精打细算是做得相当彻底的，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教务主任加一个注册工作人员就是教务处。图书馆从采购、编目到出借全由一个人包办，当然更没有文化书、乐谱、唱片的分工，同时还要向德国订购乐谱，兼管代售，还要抄乐谱。虽然是穷打算，说到精兵简政，倒也是值得参考参考的。

要办好音乐院——后来又改为音乐专科学校，需要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即教务主任。最初萧先生想延聘青主担任这个职务，不久，黄自从美国回来了，这才改变了主意。聘请黄自，还因为黄自与黄炎培的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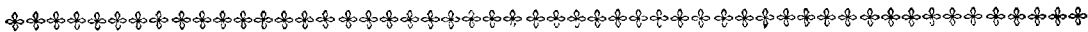
系，遭到国民党一些人的反对，只是由于蔡元培的点头，才算定局。也可见他处理事情总是出于公心，与蔡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一致的。

音专五周年纪念刊编印过一张“学生家长职业比较图”，“商”的比例几乎占了一半，这显示出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特色，对发展音乐教育来说是不相适应的。相当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有些女学生，来学的目的并不是放在音乐事业上。萧先生曾经感慨地说，一个学生在音专上了几年学，领到一张证书，只是添了一份嫁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萧先生出了一个主意，发函各省教育厅，每省保送音乐学生若干人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回原地方工作，以便促进各省音乐教育的发展。这样一来，“富丽堂皇”的高等音乐学府也有了远自边远省份来到上海的“土包子”。当然，不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点点滴滴的改良决不能改变中国音乐教育的落后状态，更不能改变音乐教育的根本方针。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使先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外不抵抗，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对内却借口国难，加强他的法西斯统治，派遣军训教官进入各学校。眼看他惨淡经营的学校有人插手进来了，他老先生还想抵挡一下，结果

当然挡不住。最后他向国民党教育部打一个秘密报告，请求调走这个军训教官。这是我替他起草的唯一的密件。报告上去，一直没有下文。哪里会有下文的呢？这简直是“与虎谋皮”！

一九三六年日本乐队指挥近卫秀麿来上海指挥那个外国人的管弦乐队，并来音专参观。为了表示“亲善”，他提出回国之后要送一架钢琴给我们。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收到日本领事馆的一封信，说近卫秀麿送给音专的钢琴已经运到了上海，请我们去商量交接手续。萧先生的答复却是拒绝接受。抗战期间汪精卫逃出重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听说也曾企图拉先生下水。因为我早已离开上海，说不出什么具体情况，只知道他始终在孤岛上维护着那所风雨飘摇的音专，一直到他逝世，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记得从前上海有一家自来水笔公司曾经约请各界名流用它的产品题字，并把这些笔迹汇印成册，证明它的金笔特别适用于写中国字。其中有一张是萧先生写的，写的是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作为近代中国辛勤创业的祖国的音乐教育家，他是体现了于谦这首诗的精神的。



湖北、武汉音乐界最近邀请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尚家骧同志来汉作了有关意大利声乐学派的学术报告。这次学术活动由音协武汉分会和湖北艺术学院联合主办，参加学术交流的有省、市各专业文艺团体和艺术学院的声乐工作者200余人。这一活动，对我省声乐学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尚家骧同志先后作了四次报告，系统地介绍了声乐发展的历史，详尽地阐述了声乐技巧的发展过程，为我省声乐工作者在借鉴西洋发声法，从而丰富民族声乐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资料。我省广大音乐工作者一再提出，希望音协及有关部门多组织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以开阔眼界，丰富和提高我们的音乐表现能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王侠）